



李揚在巴西舉行的「金磚四國」智庫峰會期間，與巴西總統府戰略事務部長吉馬斯舉行工作會談。



李揚會見法蘭西銀行副行長蘭燕。

李揚簡歷：

- 安徽懷遠人。1968年11月參加工作，曾在安徽淮南唐山鄉插隊。1984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研究生。
- 曾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 2009年7月至今，任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副院長，並任中國金融學會、中國財政學會和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



金融危機或有十年震盪

因應美狂印鈔票 中國將量化緊縮



李揚與英格蘭銀行行長金恩會面。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李揚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衝擊不能低估，未來五年甚至十年內，全球經濟很可能持續處於低速增長、劇烈波動，以至多次探底的狀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機構，可能接續出現新問題。對此，中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並制定了多種應對防範措施。目前，對應美國的量化寬鬆擴張性政策，中國正實施「量化緊縮」政策予以對應。他並強調，中國應以上世紀日本未能很好把握經濟騰飛後的整固機會為戒，不要錯失鞏固提升整體國力的戰略機遇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建華、楊帆、何凡

李揚表示，導致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舊患未除」，「新憂又至」。因此，世界經濟的恢復，不僅需要消除導致此次危機的基本因素，還須消除救助危機過程中所採用的非常規措施引起的副作用，但目前這兩方面的進展都不樂觀。

全球經濟失衡 美國要負主責

李揚表示，危機的原因可從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兩個層面分析。在實體經濟方面，危機就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格局長期存在且固定在一種狀態上，並愈演愈烈。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一些國家長期貿易逆差和債務積累，另一些國家則長期貿易順差和債權積累，且這一狀況持續惡化。美國自1971年出現戰後首次貿易逆差以來，基本上沒扭轉過貿易逆差狀況，但長期保持在佔GDP2%以內的安全區間。然而，進入本世紀以來，情況日漸嚴重，該比例在危機爆發前已接近7%，因此，美國對於全球經濟失衡難辭其咎。

對於將此現象歸咎於中國的「中國責任論」，李揚指出，這是片面的。從歷史上看，全球失衡的逆差方始終在美國一方，而順差國則順次由不同國家擔當，包括最早期的日本、德國，之後的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及至中國。在這種長期失衡格局中，美國處在強勢一端，它握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的權力，可通過發行儲備貨幣等金融手段來彌補逆差。因此，糾正全球失衡，美國須承擔主要責任，並應該對其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宏觀政策進行調整。但是，美國並未這樣做。目前美國採取的QE2（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及可能的QE3，完全就是「禍水東引」的老故事。因此，應對QE2的不利衝擊，中國只能實行量化緊縮。

這場金融危機的金融原因，李揚指出主要表現為美國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疏遠化、過度槓桿化和泡沫化，

監管缺失及不合理的國際貨幣制度。依托目前「沒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的危機迅速向全世界傳導。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保留着布雷頓森林體系那種以美元為主導的結構，但失去了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要求和政策約束。近來關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諸種方案，其實質都是讓儲備貨幣發行國承擔應有的責任並重新被套上「韁繩」。但如果了解當年美國何以堅決拋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知道這些方案均沒有可能實現。

中國須參與制定國際新規則

李揚強調，中國須積極參與國際新規則的制定過程。「在當今世界上，中國處於債權人地位上。債權人最需要的是有秩序，守秩序，而且不能由別人制定秩序，因此，我們必須參與國際經濟新規則的制定過程，充分反映我們的利益與訴求。」

他表示，此次危機雖然暴露出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發展存在過度的問題，但中國金融改革的速度不會減慢，更不會停止。「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及人民幣匯率彈性化等，是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最重要的市場化改革方略之一。」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日本前車之鑒 中國應把握機遇增國力

李揚指出，構成中國處在仍然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要素依然存在，不過，必須以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發展經驗為戒。「回想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情況在變壞，歐洲的情況向好，特別是日本正處於黃金時期，套用一句現在的話就是『日本當時處在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中。』但當時的日本陶醉於日圓升值的狀態，在國內炒股炒房，到美歐買田置地，白白喪失了戰略機遇；而美國堅定不移地進行自我調整，直至八十年代末出現新經濟，步入此後快速發展的二十年。」

他表示，以高科技引領經濟結

構調整，並有很細緻具體的後續規定跟進，是中央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強調的重點之一。「這關係國家長治久安，必須動真格的，日本當年就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努力。」

李揚指出，以往國際經濟危機之後，都會緊隨全球性債務重組，而每一次重組，均使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中的核心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強化。這一次完全不同。如今深陷債務危機中難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和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發達經濟體。他們被自己呼喚出的惡魔纏身，非有新興經濟體的援手不能解脫。因此，目前這次債務重組，可能產生有利於廣大新興市場國家的結果。

人民幣「走出去」

港金融重大契機

問：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將迎來哪些新機遇？

答：如同內地一樣，香港正處在一個比較重要的轉折期。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中美關係的變化，對香港的經濟地位和未來發展方向，具有極大影響。香港的經濟高度依賴內地，既要因應變化，也要促成變化。目前香港面臨的很多問題，歸根溯源其實就是中美關係的問題，是人民幣與美元的問題。

香港經濟依賴內地，金融聯繫匯率制又使其在金融面上與美國聯繫在一起，這種狀況，既有壓力也有機遇。香港自身的發展，宜注重結合國家戰略，比如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不久前我訪問英國，英格蘭銀行行長對我表示，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離岸金融中心，歐洲大陸的金融業不發達，其大量高端業務在倫敦展開，成就了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此，英國經濟的恢復，相當程度上依賴於歐洲經濟的恢復進程，與離岸金融中心的發展前景密切相關。他的這個判斷和評論可為香港借鑒。內地的金融業不如香港發達，但實體經濟非常強大，香港若能配合大陸發展，便能實現雙贏。

人民幣在港交易 有利國際化

中央樂見香港加快步伐，積極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客觀地說，香港得天獨厚的優勢，在包括上海的內地城市中並不存在。依托已有的國際通道，人民幣在香港交易，便得以直接進入了國際體系，並爭取到廣泛的國際投資者參與。香港的法律體系是國際的，從業人員是國際的，交易體系是國際的，創造的產品是國際的且為國際投資界認可、接受和熟悉的，這就是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優勢。利用這一優勢，一定會使大陸與香港雙贏。

人民幣「走出去」是香港金融發展千載難逢的好時機。香港若能積極發展市場，加強融合，多展開一些溝通內地與國際投資界關係的事，將大有作為，並帶動其他領域，實現再一次繁榮。香港進一步發展人民幣業務的真正基礎，在於依托國際化的金融機制，創造出合適的金融工具，吸引廣大的外國投資者。透過香港推人民幣「走出去」，目前已開了個好頭。在此過程中須注意創造一個穩定機制，實現進出有序，不要有太大的衝擊。

中國經濟學家 不遜西方同行

在中國社科院大樓李揚副院長辦公室裡，幾縷暖陽投射屋內，數棵小小的綠樹生機盎然，與窗外寒風中的萬木蕭疏形成鮮明對比，恍若強勁復甦的中國經濟與景氣低迷中的國際金融形勢。從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到後危機時代的應對，從內地通貨膨脹的爭論，到人民幣國際化給香港帶來的機遇……李揚縱論熱點，剖析爭議，言談間處處折射出中國這位高級智囊的理性和自信。

師承多位著名經濟學者

出身教師之家的李揚，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七七屆學生。他曾經當過農民、建築工人，文化大革命後復旦大學參加過工農兵學員高考，成績在全市排名第二。若非陰差陽錯，他所學的專業將會是建築。在安徽大學，李揚遇到一位名叫陳茂樹的教授，這位教授師承中國經濟學泰斗陳岱孫，畢業於天津大學，還當過國民黨中央銀行信貸科科長和南開大學教授。這位陳老師對李揚影響很大，在他報考碩士研究生時，建議他選擇當時地位不高，但在市場經濟學中最有前途的金融學。在陳教授推薦下，李揚選先後師從復旦大學陳觀烈教授和人民大學王傳倫教授專攻金融學和財政學。這兩位教授分別畢業於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

因而使李揚受到比較系統的經濟學訓練。

倡改匯率表述獲中央接納

如今，李揚在中國金融界舉足輕重。2003年，中國受到世界各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同年9月，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斯諾訪華在即，中央積極應對，將一份文件徵求意見稿送至李揚所在的社科院金融所，李揚隨即率眾反覆討論，建議改變人民幣匯率的表述，並親自向中央決策者陳述意見，獲得採納。當溫家寶總理會見斯諾時，便第一次提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吸納李揚等專家建議的這一表述，從此成為官方有關人民幣匯率的標準用語。此外，在諸如CICIC的創建、美元劇烈波動條件下的中國外匯儲備管理等眾多金融改革和發展領域，李揚的研究和建議均有一定的貢獻。

在中國，有小部分人總是以西方經濟學家馬首是瞻，貶低中國經濟學家。李揚認為，如果用理論成果是否被正統西方經濟學吸收，以及是否在國際上「前10名」的雜誌上發表過論文作衡量，中國的情況令人沮喪。但若論解決問題、教育群眾、推動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學家們與西方同行相比毫不遜色。

長期通脹壓力 中國目前並不存在

問：近期通脹成為中國經濟最受關注的話題，當前物價上漲的原因，是貨幣超發？是成本推動？還是輸入性通脹？有人認為，中國將迎來「長期通脹時代」？對此您是否認同？

答：對於中國的通脹問題，應該關注四個特殊、反常的問題：一是11月份CPI比10月多漲一個百分點，其中卻有兩個百分點歸於農產品，但中國農業卻連續第七年獲得大豐收；二是在漲價這一利益調整中，消費者受到損失，但生產者未獲相應利益，凸顯出市場組織、流通渠道存在嚴重扭曲；三是國外農產品收購機構加入倒賣者行列，國內機構也以國際市場的動態來決定其收購行為和收購價格，國內外市場強烈地相互影響；四是國內市場正向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看齊，趨於「類金融化」。

事實上中國實現了連續七年大豐收，且在十三類農產品中，穀物、蔬菜、茶葉、油料、禽蛋等十類是超產，有兩類是平產，僅棉花是減產，總體上看是基本平

衡、略有過剩的形勢。依此判斷，物價總水平不應有巨大變化，目前發生了暴漲，主要是由不正常因素推動的。須知，農產品的需求是剛性的，實體面上的供大於求的平衡關係，最終會顯示出其強烈的制約作用，不過，它很可能仍然以價格劇烈波動的方式回歸。

貨幣政策顯然解決不了上述供大於求條件下的價格暴漲問題，但價格不可能長期處於高位。從歷史上看，近十幾年來中國物價水平是最平穩的。與美國的低儲蓄下的貨幣供應增長不同，中國的貨幣供應是低儲蓄造成的。如果貨幣供應增長與財政赤字或工資不斷上漲密切關聯，便將產生真正的通脹壓力；但在中國，目前這兩個情況都不存在。因此，目前的中國不存在長期、持續通貨膨脹的壓力。

中央盼貨幣政策 無大波動復常態

問：中央將貨幣政策基調由「適度寬鬆」轉向「穩健」，這一政策調整有何深意？

怎樣應對第二輪美國量化寬鬆政策？當前的財政政策依然維持「積極」，是否也要回歸常態？

答：不要簡單地從「穩健」二字來判斷貨幣政策的取向。「穩健」的提法已有多年，從歷史上看，這個詞的內涵可以容納擴張，亦可以容納緊縮。這樣看，「穩健」一詞主要表達的是不希望有太大波動，希望回歸正常，恢復常態，從危機狀態過渡到正常狀態。它表達的是一種政策立場，並不必然表明政策方向。

以「逆風向動」為基本規則，貨幣政策從緊、從鬆，還是中性，要看宏觀經濟形勢的狀況，目前當然需要適當收緊。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貨幣政策僅僅需要應對國內目標，而今，國際因素日漸重要。只要美國繼續採取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國就很可能繼續緊縮，且對應關係也漸漸密切，以量化的對量。

財政政策要看財政平衡狀況，要看實際赤字的規模是擴大還是縮小。2010年的財政政策其實是緊縮的。中國經濟的基本態勢是供大於求，儲蓄大於投資。政府存款是基礎貨幣的組成部分。政府存款增加，意味著有政府稅收通過央行變成貨幣供應進入市場。這使得中國的貨幣供應的產生機制、鬆緊含義以及調控機制等，同那些儲蓄不足和財政長期赤字的國家有根本性差別。